

# 农村社会工作者择业和离职动机 及其影响因素

何宇飞,万江红\*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 探讨农村社会工作者择业和离职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场域理论和阿兰·图海纳对于主体概念的解释,对21个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案例分析发现,这一职业群体可按择业动机分为三类:生存生活型、职业发展型和利他反思型。总体来看,他们既有对于生存和生活的现实诉求,也渴望获得意义感,成为具备创造性乃至利他性的主体。而农村社会工作作为职业场域,其中的行业、机构、政府或政策以及农村社区等环境性要素既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部分优势满足了具备特定动机的农村社会工作者主体性生成的需要;也存在与城市社会工作相似的诸多限制,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者离职意愿或行为的产生。因此,提出不仅要着力提升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待遇福利,更要为其提供更多的行动空间以及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应当开发可以测量社会工作者改造社会、践行利他主义和反思主流价值观等意愿强度的量表,并将其应用到对该职业群体的考察中。

**关键词** 农村社会工作者;择业动机;离职动机;场域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3)02-0169-13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3.02.017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组织引导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早在2021年,《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如火如荼。2020年底广东省将“双百计划”升级为“双百工程”,2018年湖南省开展的“禾计划”都致力于实现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全覆盖。湖北、浙江、重庆等地也先后积极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站的建设。建设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参与乡村振兴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使命。

然而,我国社会工作总体上仍然存在低制度化、弱专业化的行业特点。有研究指出,农村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农村社工”)面临待遇偏低、专业自主性偏弱、社会认同度不高等问题<sup>[1]</sup>。相较于农村,城市的教育、医疗、娱乐设施更完善,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大。在行业和地域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个体选择农村社会工作为职业似乎阻力重重。大量的研究也得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存在困境的结论,并将其归因于激励机制供应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制度性因素<sup>[2]</sup>。

影响个体从事农村社会工作意愿的,不仅有外在的制度因素,更有微观的情境影响和内在的个人价值构建。现实中存在着部分选择成为农村社工甚至长期坚守在这一岗位上的个体,他们做出看似违背“经济理性”的择业决策,其动机是什么?其中一些人为何又选择了离职?农村社会工作作为

收稿日期:2022-0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弱势群体生计改善的案例研究:干预策略与结构性障碍”(19YJC840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662022WIFYJ002)。

\*为通讯作者。

特定职业场域,有哪些特点影响了从业者的择业和离职决策?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影响农村社工择业和离职的动机及环境因素,以期优化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政策提供更多的经验性依据,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目前,直接探讨中国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从业动机的研究并不多。Liu利用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揭示了中国社工在关注公共利益和自我牺牲维度上的动机<sup>[3]</sup>。专门研究农村社工择业动机和离职原因的文献相对较少,但有关中国社工离职倾向和职业认同的研究、国内外农村社工的研究可以为本文提供参考。

### 1. 社工的离职倾向和职业认同

由于中国内地的社工离职率较高,围绕离职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多。离职倾向是指员工经过考虑主动离开组织的意愿。人口学变量中,年龄是被大部分研究证明对于离职倾向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于事业稳定性的要求较大。已有数据也表明,社工越年轻则离职倾向越高<sup>[4-5]</sup>。其次是性别,男性由于经济压力较大,其离职倾向高于女性<sup>[4,6]</sup>。针对婚姻状况、学历、收入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于离职倾向的作用显著性以及影响方向,不同研究的结论则存在不同<sup>[6-8]</sup>。

在对相关人口学变量的讨论中,薪酬的作用值得关注。社工行业较低的薪酬被认为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社工被认为是价值注满的个人,但一些实证研究验证了薪酬激励对于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影响<sup>[4,6]</sup>,而另一些则得出薪酬激励影响不显著的结论<sup>[5]</sup>。这些不同的结论一方面推动了“社工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争论;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社工离职倾向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既有个人层面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约束;既有经济维度的动力,也有对人际关系、归属感等社会心理维度的追寻。

因此,除了人口学变量,部分对于职业的主观感受性因素也被纳入到考察中。职业认同、工作满意度、个人—组织匹配程度等都属于此类变量,亦被证明对于离职倾向有显著影响<sup>[6,9]</sup>。其中对于职业认同的研究最为广泛。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社工对待遇、职业荣誉、职业地位和职业前景方面的认同影响着其离职倾向<sup>[6]</sup>,社工的职业倦怠感也会作用于职业认同,从而强化离职倾向<sup>[10]</sup>。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出发,政府、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的承认态度也会影响社工的职业认同以及离职倾向<sup>[11-12]</sup>。

少数学者关注到社工职业认同的主体建构过程。有学者认为职业实践与意义追寻是社工职业认同的自我建构,国家和地方政策推动的职业化发展、学界的理论知识生产和社工的行业共同体建设则成为其职业认同的群体构建<sup>[11]</sup>。有文献则通过质性研究分析了社工职业认同建构与解构的影响因素,指出机构的高质量督导与民主化管理、同工的互相支持和居民的认可都帮助社工强化了职业认同,而机构的行政化和趋利性倾向、职业的薪酬待遇低和晋升空间有限则削弱了职业认同<sup>[13]</sup>。亦有研究通过梳理3个社工10年的职业经历,分析了社工在职业流动中通过行业比较强化职业认同的过程<sup>[14]</sup>。

上述有关社工离职倾向和职业认同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内在价值因素和主观感受对于社工从业意愿的影响,但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由于城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首发阵地”,这些研究大多以城市社工为调查对象,对农村社工的描述和分析较少。其次,这些研究多是对横截面数据的定量分析,质性研究较少。采用特定的样本,利用模型中给定的变量进行探讨,虽然能够给出“符合科学逻辑”的结论,但也因为将在情境中的人化约为数据和变量而损失了部分动态性信息。此外,有关离职倾向的研究讨论了“因何而走”,却没有询问“为何而来”,忽略了对社工入职前的动机探讨,削弱了对于离职原因分析的整全性。

### 2. 有关农村社会工作者的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社会工作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行业新的发展方向。原有的职业化

进程推进缓慢,政府投入不足,岗位设置过少等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其服务效能也开始被政府和服务对象认可<sup>[15]</sup>。然而农村社会工作也面临行政依赖性强<sup>[16]</sup>、专业认同度低<sup>[1]</sup>、专业自主性低<sup>[17]</sup>等行业问题。2019年,华东理工大学组织的“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共收集了5965个样本数据,其中在农村地区工作的社工754名<sup>[18]</sup>,占比12.6%。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农村社工已成为社会工作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发现,农村社工存在专业自信和专业认知不够带来的挫败感以及对于前途的迷茫感<sup>[19]</sup>;但对于我国农村社工的研究数量依然较少。

国外有关农村社工的研究数量更多。在偏僻、开放、非匿名的农村社区工作,社工要面临隐私易泄露、交通成本较高、服务支持缺乏等挑战<sup>[20]</sup>。有学者发现城市和农村社工之间的职业倦怠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sup>[21]</sup>。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农村社工大部分满意自己提供的社会服务。其原因可能是他们能在小型社区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服务成果,而充满挑战的环境则强化了对服务成果的感受<sup>[22]</sup>。澳大利亚的农村社工大部分有过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并且对农村的生活方式感到满意<sup>[23]</sup>。相较于国内文献,国外文献不仅关注农村社工面临的问题,也探讨了他们从工作中的获益,为农村社工的择业动机做了部分解释。

### 3. 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场域理论、阿兰·图海纳对于主体概念的解释,分类探讨农村社工从业的动机,在考察社工个人主体意识的同时,探索农村社会工作行业环境对于他们择业和离职的影响。布迪厄认为,分化的社会世界由一个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空间构成,这些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和权力关系的空间即是场域: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场域中各个要素的特征也是鲜明的<sup>[24]</sup>。笔者认为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场域有鲜明的特征,可以分为主体性要素和环境性要素两方面。

主体性要素主要指与农村社工自身特点及其价值取向有关的要素,包括农村社工对于自己生活需求、生活目标和方式的界定与规划,决定了农村社工择业和离职的动机。布迪厄利用“惯习”的概念,已经揭示出场域中的行动者拥有创造性的特点。相较于惯习,“主体”这一概念更突出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援引阿兰·图海纳对于主体和主体性的论述,丁瑜将主体解释为“由个人利益出发,通过社会参与改变陈旧观念,最终达成社会价值、文化重塑的行动者”,并认为主体以“纯粹的社会性”为目的开展行动,提倡塑造新的文化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sup>[25]</sup>。图海纳认为主体是“个人想成为行动者的愿望”,其形成过程是对于大众文化和社群的双重摆脱。此外,劳动对于主体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人们通过劳动意识到自己能够改变物质环境,从而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历史的行动者和创造者<sup>[26]</sup>。

参照其他学者对于社会工作职业场域的内部划分,本文认为环境性要素是指农村社会工作机构、农村社区、相关政策和政府部门的态度等影响农村社工的客观性因素。社会学家托马斯从互动论出发,提出“情境定义”,认为人们在行动之前,会对情境进行主观解释并据此决定自己的行动,个体会对相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解释<sup>[27]</sup>。情境定义实质上可以看做是个人面对环境发挥主体性的体现。在本文的研究中,虽然机构的管理、农村社区的反馈、政府的支持力度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同的社工对于这些因素的解释和判断不同,也会影响他们对于是否继续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看法。

图1展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农村社工不仅是为了生存和生活的个体,也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主体性要素决定了他们的动机,从而产生了不同动机类型的农村社工。作为个体工作者,他们受到环境性要素的影响,也通过情境定义去阐释工作环境,最终做出从业或离职的决策。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

依靠笔者之前驻点调查所结识的农村社工进行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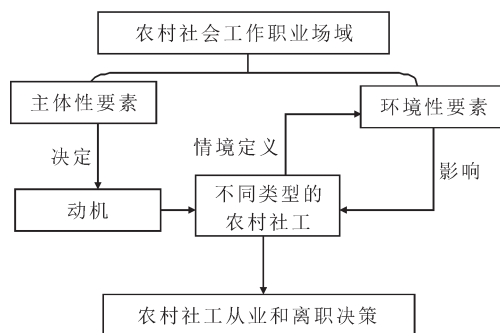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雪球抽样,研究团队于2019—2020年选取了21个农村社工展开访谈,并在2021年对部分访谈对象展开了回访,以了解他们的工作现状。访谈样本来自在湖北、广东等省的6个机构;其中男性7人,女性14人;访谈对象的年龄最小为23岁,最大为37岁;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时长最短为9个月,最长为8年。本文将每个访谈对象视作一个案例。表1是21个案例的基本信息。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 编号/称呼 | 年龄 | 性别 | 婚否 | 学历 | 专业   | 从事农村社工时长 | 目前是否从事农村社工 | 是否有离职意愿        |
|-------|----|----|----|----|------|----------|------------|----------------|
| 1.小瑶  | 24 | 女  | 否  | 本科 | 社会工作 | 1年       | 是          | 是              |
| 2.小王  | 24 | 男  | 否  | 本科 | 心理学  | 9个月      | 否          | 不适用            |
| 3.阿敏  | 27 | 女  | 否  | 本科 | 心理学  | 1年       | 是          | 是              |
| 4.阿芳  | 29 | 女  | 是  | 大专 | 心理学  | 3年       | 是          | 是              |
| 5.小余  | 25 | 女  | 否  | 硕士 | 社会工作 | 2年       | 否          | 不适用            |
| 6.罗姐  | 37 | 女  | 是  | 高中 | 无    | 1年       | 是          | 是              |
| 7.大明  | 34 | 男  | 否  | 本科 | 社会工作 | 1年       | 是          | 是              |
| 8.小田  | 23 | 男  | 否  | 本科 | 社会工作 | 1年       | 是          | 否 <sup>①</sup> |
| 9.小才  | 26 | 男  | 否  | 本科 | 社会工作 | 6年       | 否          | 不适用            |
| 10.阿甘 | 30 | 男  | 否  | 本科 | 社会工作 | 8年       | 是          | 否              |
| 11.媛媛 | 29 | 女  | 是  | 本科 | 社会工作 | 5年       | 否          | 不适用            |
| 12.小耳 | 26 | 女  | 否  | 本科 | 社会工作 | 3年       | 否          | 不适用            |
| 13.阿文 | 32 | 男  | 是  | 硕士 | 社会工作 | 2年       | 否          | 不适用            |
| 14.小霞 | 34 | 女  | 是  | 本科 | 社会工作 | 2年       | 是          | 否              |
| 15.阿力 | 36 | 男  | 是  | 硕士 | 社会学  | 5年       | 是          | 是              |
| 16.小超 | 34 | 女  | 否  | 本科 | 艺术学  | 3年       | 是          | 否              |
| 17.阿木 | 34 | 女  | 是  | 硕士 | 社会工作 | 6年       | 是          | 否              |
| 18.小丁 | 35 | 女  | 是  | 硕士 | 社会保障 | 2年       | 是          | 否              |
| 19.小娥 | 32 | 女  | 否  | 本科 | 数学   | 6年       | 是          | 否              |
| 20.小阳 | 26 | 男  | 否  | 硕士 | 社会工作 | 2年       | 是          | 否              |
| 21.小白 | 32 | 女  | 否  | 硕士 | 社会工作 | 4年       | 是          | 否              |

研究团队将所有访谈内容转录成文字,借鉴扎根理论进行了开放式编码和轴心编码。开放式编码主要根据访谈对象对于从业动机和工作感受的叙述,生成了“成长机会”“待遇好”“实践出真知”“照顾家庭”“希望帮助更需要的人”“农村成长的经历”“行业资源和地位”“下班后生活无聊”“与机构价值观存在偏差”等共计21个一级编码。在轴心编码过程中,这21个开放式编码被归纳为“个人—工具理性”“个人—价值理性”“机构因素”“行业因素”“政府或政策因素”“社区因素”6个二级编码。其中“个人—工具理性”指对个人生存生活和事业发展等现实的考虑,“个人—价值理性”指具备利他主义或对社会的反思能力。这两个二级编码反映了访谈对象做出从业或离职决策的主体性要素,并帮助课题组最终将访谈对象的从业动机分为三类:生存生活型、职业发展型和利他反思型。另外4个二级编码则体现了访谈对象所处的环境要素。不同类型的访谈对象所处的具体职业场域环境不同,对于环境要素的感知和情境定义亦有不同,最终反作用于主体性要素,加强或削弱了访谈对象原有的从业动机,促使他们做出继续从业或离职的决策。

### 三、生存生活型农村社会工作者分析

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型,多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受学校知名度和所学专业的影响,他们的就业选择相对较少。其择业的主要动机是解决就业和生存问题。另一类则可称作家庭照顾型。这一类型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行业的女性化现状,多为婚育年龄的女性。

① 案例8由其他农村社工机构转入目前单位继续从事农村社会工作,在新单位于调查时尚没有离职的想法。

工作是否能为“顾家”提供方便是她们最看重的。这两类农村社工的特征虽有不同,但从主体性因素上看,都为了生存或生活的目的而择业,且大多数均为一线社工。影响这二者产生离职意愿或行为的环境性因素有较多相似之处——如机构的弹性工作制、社区的偏僻性、行业的限制,因此本文将二者合并为一大类展开分析。

### 1. 生存和“顾家”需要的满足

(1)较好的待遇。部分访谈对象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了吸引人才,同一地区部分农村社会工作机构的岗位薪酬比城市略高。由于工作地点偏僻,加之农村租住成本较低,农村社会工作机构一般会提供住处,又可为员工省下一笔开支以及找房的时间成本。这些特点恰恰满足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就业和安置的需求。

**案例1和案例12:**24岁的小瑶和29岁的小耳本科为社会工作专业。她们毕业时均同时被城市和农村的社工机构录用,但最终都选择了农村社工机构。小瑶认为“农村社工站能够提供住宿,可以省钱,而且不用费心找房子”。小耳同样被“包吃包住”的待遇吸引,且农村社工机构“工资还稍微高一点”,就留了下来。

另一些访谈对象虽然未将农村社会工作作为人生的第一份职业,但尚处于职业生涯的试错期。小王(案例2)和阿敏(案例3)之前的工作分别是销售和民办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因原来工作压力大等原因选择跳槽。年轻的他们积蓄较少,机构“包吃包住”成为吸引他们的环境性要素之一。加之农村社工需要“与人打交道”,与原来的工作性质有类似之处,农村社会工作成为可以同时满足他们待遇需求和职业过渡的选择。

(2)弹性工作制。已有研究发现,女性会因为工作稳定、方便照顾家庭而选择从事社会工作,并成为行业的主力军<sup>[14]</sup>。家庭照顾型农村社工往往是社工站附近的本地人,工作离家近以及机构可能提供的弹性工作制是吸引她们的环境性要素。

**案例4和案例6:**29岁的阿芳之前在广州做社工,2017年回到老家成为某农村社工站的站长。“回来主要是为了完成人生大事,跟对象把婚结了”。37岁的罗姐是某机构的一名本土社工,其丈夫在省会城市打工。为了照顾两个女儿,罗姐之前没有出去工作,直到因参与社工举办的活动而吸纳为本土社工。她认为“目前的工作离家很近,方便照顾孩子”。

工作一段时间后,罗姐发现接送孩子的时间仍然紧张,曾提出过辞职。但机构为了挽留她,对她实施了弹性工作制:允许她每天工作半天,早上可以晚到半小时。罗姐所在机构的负责人认为:机构在偏僻的农村想招募合适的本土人才,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敏感性。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在时空联系上较紧密。从主体性要素来看,本土人才对于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求较高。尊重这种生活习惯,并允许一定的弹性工作时间可以更好地吸引本土人才<sup>①</sup>。

### 2. 无力感的产生

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最初的择业动机是解决自己的就业或家庭问题,但同样也有对意义感的追求。这种主体性虽然比较微弱,然而当它无法被满足时,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职业的不稳定性也会随之提高。访谈样本中共有7个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其中2个已经离职,另有4人表示可能离职。在访谈中,地理位置的偏僻性和工作性质是被提及较多的让其产生无力感的因素。

(1)偏远的社区。“偏僻性”是国际社会工作学界讨论农村社会工作时最为常见的议题之一,指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地点地理位置距离资源中心较远。偏僻性使得农村社工在工作中缺少督导和信息源,在生活上缺乏娱乐设施。

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大部分为一线人员。限于职级,他们获得的行业发展信息相对较少,对于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更高。尤其是年轻的生存型农村社工,他们往往并非农村社工站点所在地的

① 笔者在其他地方的农村社工机构也看到类似的做法。

“本地人”,在适应当地生活上面临挑战。此外,他们多有在城市求学的经历,追求生活的丰富性、趣味性。偏僻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娱乐、交友的需要。上文提及的小瑶明确表示:“不确定在这里还能工作多久。因为这里太偏了,没什么娱乐设施,周末连饭馆都不开,泡面都吃腻了。”

(2)行业:工作文牍化和有限的资源动员力。中国内地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借鉴了西方国家管理主义的经验,推动了社会工作机构“文牍化”和“痕迹主义”的管理模式,以留有充分的台账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农村社工需要处理大量的工作台账,而工作的文牍化容易让访谈对象产生倦怠感。阿敏能从“四点半课堂上教会小孩子一道题”获得成就感,小瑶则“在与小孩或阿姨打交道时感到开心”。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实际工作中真正与服务对象直接接触的时间太少,大量的精力被消耗在写作和修改工作文档上。阿敏说道:

开活动总共其实才两个小时,但是之前写策划、做文档要花好多时间,写得好还好能够一遍过,写得不好还得被打回来重新写,要改好几遍。还有各种总结、评估资料要来回整理。

岗位有限的资源动员能力也会影响访谈对象的离职意愿。中国内地的社工往往没有动员制度性社会福利资源的能力。农村社工遇到家中贫困或有病人的家庭时,由于无法向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感到“力不从心”。阿芳说道:

很多人会向我们求助,我们在农村常遇到重病缺钱的这一类群体,但是我能给的帮助太有限了,只能帮他们做一些网络支持,联系一些社会人士。

这种无力感普遍存在于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中。和服务对象生活在一个社区是农村社工的重要职业特征<sup>[22]</sup>,服务对象可能同时也是他们的邻居,对于本土社工来说还可能是亲友。潜在的双重关系使农村社工能近距离地感受服务对象的实际困难,同时也扩大了他们对服务对象实际帮助有限的无力感,并在这一情境中将自己定义成“只能听服务对象说说”的角色。

当偏僻的地理环境与工作文牍化、资源动员困难等因素叠加在一起时,生存型农村社工很容易产生一种倦怠——工作和生活毫无波澜但又充满琐碎而繁杂的文书事务,以及一种“生存无忧但盼望较少”的感觉。如阿敏所说:

是比较的安逸吧,农村待着太安逸了,每天按时起床,按时上班,待着待着就会感觉自己都老了。

#### 四、职业发展型农村社会工作者分析

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既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具备一定行业经验的人。从主体性要素来看,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创造和控制”的主体,拥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机会。通过实践获得意义感,以及看重农村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是这一类型的动机特征。这类农村社工大多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在大学时期已具备一定的行业接触深度,目前大多在机构担任中高层管理人员。上述特点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前景。

##### 1.“创造和控制”的主体及其生成

(1)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意义感体验。图海纳强调劳动创造对于主体形成的作用:劳动成果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强化人们的主体性<sup>[26]</sup>。访谈发现,大学时期的实习实践过程恰恰带来了这种主体性体验。访谈对象中共有8名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其中4人提到了他们在毕业前参与过农村社会工作实习。

**案例13:**阿文在一所985高校的社工系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他直言由于当时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弱,“在学的过程中经常会怀疑这个专业到底有没有用”。2008年,阿文跟随系里新来的老师在汶川地震灾区完成了毕业实习,这成为他“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的转折点”。阿文



和村民们一起清理废墟,组织村民跳广场舞,还承担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的任务,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他自述“在那三个月能真正地感觉到生命影响生命”。最终,阿文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并在毕业后留在了那位老师创办的机构继续从事农村社会工作。

**案例 11:**媛媛没有遇到一个可以带来优质实习机会的老师。她和同学们“干脆自己出去找实习机会”。从大一给村民买树苗并展开调查,到成立学生社团下乡开展社会服务,再到与北京的机构合作进行募款,媛媛越来越感受到“社工如果要玩起来的话,特别有意思。”毕业后她留在实习的一家社工机构继续从事农村社工。

经由实践获得参与感和创造性体验,进而产生的主体性,让阿文和媛媛对自己的专业有了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社区的小型化和空间的开放性以及社区内部经由非正式关系而形成的人际联结,使得这些访谈对象可以近距离感受到村民的接纳和给社区带来的改变,从而获得更好的实践体验。高质量的实践体验帮助他们摆脱了对书本知识的不确定性、对专业概念的模糊感以及对生活和学习的无聊感并生成“创造性的主体”,使他们愿意在毕业后从事农村社会工作。

(2)行业机会。对于未来发展机会的现实考虑,是个体在竞争性的社会结构中所形成的惯习,对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的影响更明显。小余(案例5)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后被深圳的某社工机构录用,但她最终决定回到毕业地做农村社工,工作半年后升任机构的副总干事。小余认为:

一个岗位上有一千个人竞争,你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但是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岗位上,可能就只有十个和你有同样学历的人竞争,那你能得到的机会就是十分之一。当时我做农村社工有机会和区市一级的政府官员谈事、协商,这应该是其他职业无法带来的机会。

小田(案例8)则展现了更大的野心。他本科毕业前就来到目前的工作单位实习,恰逢单位新注册一个小型社工机构专门运营某农村社会工作项目。小田毕业后留在该机构,一年后被任命为该机构的副总干事。他“希望三年内做到机构老大,在本地行业里有一定的影响。”

从环境性要素来看,农村社会工作行业在提供个人生存和发展机会上,并非如同想象一般毫无吸引力。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相对后发的领域,农村社会工作的行业竞争较少。具备一定能力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从事中高级职位,并在与政府部门、其他机构的互动中积累社会资本,从而获取更多成长机会。

(3)政策利好与行动空间。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有关农村发展的战略的提出,支持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在近年来密集地出台,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丰富的资源。通过参与社会达到自我实现,是主体性的另一种体现。而政策利好通过强化这种主体性,增加了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对职业前景的信心。阿文描述了他的感受:

国家现在非常重视农村的社会建设,给农村投放了大量的资源。虽然一些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但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在资源大量投放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是有很大的空间的,个人在其中可以发挥更大的自我价值。

基层行动空间是职业发展型访谈对象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的环境性要素。主体本身具有“创造和控制的意志”<sup>[26]</sup>。社会工作机构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常常面临自主性获得的问题,从而压制了个体社工的主体性,导致部分人员离职。然而,对于上述现象的讨论多是在城市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互动的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场域则有所不同。农村基层治理自税费改革后存在“治理弱化”的倾向。虽然近年来,中央提倡治理重心下沉,但既有的治理特征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相较于城市街区权力,农村乡镇政府多忙于经济发展,无暇顾及作为“新到之客”的社会工作机构,较少在“专业建制化”上费心思。

相反,有访谈对象提到乡镇干部希望能够借社会工作机构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在基层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将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伙伴”而非“伙计”来实

现共赢。在农村基层,这种被凸显的专业自主性,可以增加社工主体性中的独立感和控制感,从而吸引其从业。小余分享她在城市和农村工作的经历:

我去S市的那一年,市里就要求所有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工站全部改制,……我们的工作团队里面不全是社工,有可能有社区的人员。其实这种工作团队并不纯粹,大家的立场不一样,价值取向不一样,在一起工作其实很难受的。但是我现在做农村社会工作,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我更希望我们的团队是独立的,这里就能够给我这个空间。

## 2. 离职与“更高”的追求

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在对最初吸引人的行业机会习以为常之后,逐步认识到社工机构和行业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并产生离职行为。跟踪调查发现,被访谈的8名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有4名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其中2人转入其他社工机构任职,另2人则分别去了企业和高校。

(1)机构的晋升空间和薪酬水平有限。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多在机构的中高层岗位,接触资源和积累社会资本的机会更多,无力感相对较少,因此他们很少提及文牍化和资源动员能力弱而产生的困扰。晋升空间和薪酬水平有限则是提及较多的因素。

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具备较强的事业心,能力也比较突出,更容易通过跳槽选择职级和薪酬更高的岗位。当晋升到一定程度,他们对最初为之心动的行业机会司空见惯。加之晋升体系尚不完善、晋升空间有限是社工行业的特征之一,可能推动他们产生离职意愿。小田未能在原所在机构总干事换届时升职,于是跳槽到了另一家新成立的机构担任总干事。小余和阿文则明确表示希望能够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因此离职分别去了企业和高校。

(2)行业对视野和社会参与的限制。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尤其是提及在实践中获得意义感的访谈对象,他们的主体形成需要更多地参与改造社会。他们渴望遇见更多有想法的思考者,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改造世界。调查发现,随着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职业生涯的推进,他们会看到更多行业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以及自己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所面临的局限。获得更好的机会去“开阔眼界”并更深入地参与社会,是他们的离职原因之一。

在回访中,小余谈到离职原因时,分享了很多自己对行业的思考,包括行业门槛不高,部分机构的营利性策略压制了员工的创造性。她用“不够精彩”来形容原来的工作,与第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表现的对农村社会工作的热情反差甚大。她认为目前企业的工作让她学到更多的技能、了解不同社会部门的运行而“更加有趣”。小余在工作之余继续关注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甚至可以为笔者提供地区性的相关政策文件。阿文离职后,在高校带领学生开展农村社工实习,并且挂职在政府部门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在与涉农企业、地方政府、普通村民更深入的交流中,阿文觉得“越来越有劲儿,也越来越知道如何去将一些政策落实在地真正地帮助农民”。

## 五、利他反思型农村社会工作者分析

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或是一直从事农村社会工作行业,或是从其他行业转入。在主体性要素上,他们兼具利他和反思两个特性,试图探索另一种生活可能。希望帮助弱势群体,并且通过体验农村生活反思主流的城市文化,是他们从事农村社工的主要动机。

### 1. 利他性主体的实现

(1)农村社区资源约束和空间聚合的作用。图海纳的主体概念带有自由主义的痕迹,因此他认为主体是人们“个性化的需要”,甚至是个人对于市场法则和所在社群的个性化反抗<sup>[26]</sup>。利他型农村社工在职业经历中,通过认识到自己的利他性动机来发现“个性化的主体”。一些访谈对象反复提及“不在乎金钱”“希望帮助更多人”等心理状态。他们对于社会不公平现象更敏感,并希望通过自己的



行动改变社会。此外,他们中有一部分来自农村。对农村问题有天然的关注和思考,农村社会工作因此成为他们精神追求、故土情结和事业发展的结合点。

**案例16:**小超毕业于某知名美术学院,本科在某地山区长期支教。毕业后她成为该地区的公务员,但却觉得直接接触山区百姓的机会不多,于是辞职创办了A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山区的孩子提供公益性的艺术教育。她“羡慕很多同学已经在大城市买房”,但直言“不能逼着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

**案例21:**小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就读时通过参与公益项目接触过弱势群体,“感受到他们特别需要帮助”。她在找工作时被专门做农村社会工作的机构A吸引,“因为我也是农村长大的,知道农村有更多的弱势群体,更加缺乏资源。”

从环境性要素来看,农村社区的资源约束和空间聚合两个特征可以强化这类农村社工对于利他性目标的感受,从而凸显他们的主体性。农村社区通常比城市社区面临更大的资源约束,特定群体更容易对社工表现出热情的接纳,让社工感受到自己给社区带来的实质性改变。从广州回到老家做农村社工的阿力(案例15)认为:

广州那边(指城市地区)也有认可度,但是不会像这边这么高。因为他们的弱势群体不像农村地区这么明显。虽然现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这些政策带来了一些资源。但是村里的残疾人、老人平时在精神上受到的关注少。我们去跟他们聊一下,他们就很感激。

农村社区的空间聚合性表现在农村社工的生活和职业空间是相互重叠的。他们与服务对象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可以近距离观察服务对象的改变。加之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特质,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比较容易感受到服务对象对自己的认可,从而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效,体验到利他性主体的实现。小白谈到:

在农村,我很直观地很深切地感受到我的服务对他们来讲会有改善和帮助。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是需要我的。我同事称呼那些孩子就是“我孩子们”。我们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在农村工作,我觉得社工可能是我会从事一辈子的事情。

(2)反思主流文化:社区和机构的作用。几位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提到在农村的工作可以带来“超越平常生活的体验”。农村社区对人情的重视,与大自然的接近,以及部分少数民族村落特定的文化传统,更可能带给人们异于主流文化的反馈,推动人们反思物质主义和市场法则,去思考自己希望拥有的生活。小白用“进村上瘾症”描述自己,她谈到村民们的真诚热情、乐观以及平和让她“刻骨铭心”,推动她从对物质的关注中苏醒过来:

我虽然在农村长大,但在城里上了大学再回到农村,发现农村有很多东西是我以前感觉不到的:村民对我们特别真诚,他们会在村口等我们很久,人与人之间那种感情……还有他们那种跟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念大学时考虑的就是要拿多少工资,将来买房子怎么样,但是当时在村子里很多人地震后还守在自己家,把一片片的废墟重新挖出来种田,在那么悲伤的时候他们还在一块儿跳藏族的锅庄舞。他们最尊敬的人并不是官员或富人,而是村里80岁的喇嘛。山上偶尔有石头滑下来,但他们都没有那种危险的感觉,还是爬到山顶上去拜佛寺。我在那一段时间受到的冲击很大,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生活观念、生活方式还有人之间那种感情。

农村社工机构在推动社工反思上也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主体的构建需要与各种威胁性力量进行抗争<sup>[26]</sup>。无论是意识到自己利他的个性,还是受到工作成果的激励,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消费主义和市场法则的影响。部分机构推动员工反思城市化问题,思考农村问题的社会成因。机构在塑造组织文化的同时,帮助员工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发现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这也

会强化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的价值动机。毕业后一直从事农村社工达8年的阿甘(案例10)分享到:

我们机构通过开读书会、请老师来分享,让我们去反思自己的生活跟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了解到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有机种植的可贵。如果只把农村社会工作当成一个工作,可能有人会离开。但如果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就是很喜欢跟村民打交道,很喜欢去搞种植,我就愿意待在这个地方继续去做这个事。

## 2. 机构价值观的不匹配与政府的质疑

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的职业坚守意愿相对较高。所有访谈对象中,从事农村社工时间最长的阿甘(案例10,8年)和小才(案例9,6年)均属于利他反思型。被访谈的6个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有两个准备离开原所在机构,去其他机构继续从事农村社会工作这一行业。另有一人因所在机构注销而去考公务员。其余3人则表示没有离职意愿。

(1)个人与机构价值观的背离。Chatman提出,与组织价值观匹配的员工工作满意度较高,员工则不轻易离开组织<sup>[28]</sup>。访谈发现,机构在利他反思型社工选择继续从业还是离开上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不同的机构具有不同的组织文化,一些机构如上文阿甘所述起到正向作用,另一些则起到相反的作用。目前,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主要依靠招投标获得政府购买项目。机构在“活命”和“使命”之间面临抉择,容易出现牺牲服务质量换取项目数量的情况。另一方面,部分机构采用营利性管理策略,损害了公益性机构应该有的民主和透明特质。这些情况与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的助人价值观相悖,从而推动利他反思型社工产生离职意愿和离职行为。

**案例7:**大明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后长期从事销售工作,并“做到一定的层级”。他认为“自己目前已经不追求物质了,只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然而,访谈时他明确表示自己要离职。主要原因是“目前的机构大量使用学生作为实习生,学生好不容易跟村民混熟了又要回学校。这种模式无法提供有保证的社会服务,也很不专业。”

**案例15:**阿力硕士毕业后在公益行业摸爬滚打过一段时间,后来迫于经济压力做了一段时间的销售,之后又重新回到社工行业。他离职的原因是“财务不透明,自己作为项目主管都不清楚项目的财务状况。”目前他在另一家农村公益机构工作。

(2)政府的质疑。地方和基层政府通过发展社会工作而达到治理创新,其前提是保证治理的稳定性。政府对于社会工作的态度往往是“既支持又质疑”。部分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对于服务对象的热忱和长期坚守,容易为所在机构乃至自身赢得当地百姓的赞誉。当这些赞誉或肯定比较多时,可能引发当地政府对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壮大后的关注。

**案例9:**小才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后在某省的藏地牧区从事社会工作6年,帮助牧民建立社区厨房,为有需要的牧民链接医疗资源。牧民对他也非常感恩。随着小才在当地的社会声望越来越大,当地政府担心小才个人和所在机构可能会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产生一定风险。于是终止了对于机构的项目购买,机构最终注销。小才开始准备考公务员。

小才的案例发生在民族地区,政府对于治理风险的防范意识更高。然而这并非个案,笔者也遇到其他农村社工谈到项目突然被撤销的情况。利他反思型社工在认同机构理念的情况下离职的可能性较小。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而实施的突然干预,是他们离职最无可奈何也不得不接受的理由。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主体性要素和环境性要素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村社工择业或离职的因素。从主体性要素出发,农村社工可以按照动机类型分为生存生活型、职业发展型和利他反思型。即便是对于现

实考虑较多的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也希望获得意义感。职业发展型和利他反思型则分别突显了从业者对于改造社会、践行利他主义的主体性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三类农村社工可能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生存生活型的农村社工在适应自己的岗位后,可能发现行业的机会,并晋升职位,转换为职业发展型。随着职业的推进,生存生活型和职业发展型在更多地体验农村社区的生活后,也可能向利他反思型转化。但因为农村社工的流动性较大,最终实现类型转化的人员数量比较少。利他反思型的职业稳定性最高,他们的离职也多是“业内离职”,一般不会转换行业。

本文也揭示了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场域中机构、行业、政府或政策、社区等环境性要素的特点。如表2所示,部分特点扮演了拉力因素的角色,吸引了具备特定主体性要素的从业者。部分特点则扮演了推力因素的角色,提升了农村社工的离职意愿或离职行为的发生率。表2所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本文与以往探讨城市社会工作者的研究展开对话——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场域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具有与城市社会工作相似的行业普遍性特征。

表2 影响农村社工择业和离职的要素

| 动机类型  | 主体性要素                            | 环境性要素   |  |
|-------|----------------------------------|---|--|
|       |                                  | 拉力要素  | 推力要素   |
| 生存生活型 | 解决就业和生存问题,或应对婚育压力                | 机构:提供住处且待遇可能较城市同岗位高;站点离家较近、本土化下的弹性工作                              | 社区:地理位置偏僻;行业:工作文牍化、资源动员困难                          |
| 职业发展型 | 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实现“创造和控制”的主体意志;追求职业上升机会 | 社区:开放性和小型性提供更有质量的实践体验;行业:后发领域竞争较少;政府/政策:乡村振兴的政策利好和基层的行动空间         | 行业:晋升空间和薪酬水平有限                                     |
| 利他反思型 | 通过助人和反思主流的城市文化,实现“个性化的主体”        | 社区:资源约束和空间聚合凸显助人活动的成效,超越对单一物质层面的关注刺激反思主流文化;机构:部分机构重视塑造组织文化、推动员工思考 | 机构:部分机构牺牲服务质量,财务不透明;政府/政策:出于对治理风险的防范,而终止对社会工作机构的支持 |

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拉力因素上。与城市社会工作相比,农村社会工作的职业环境并非毫无优势。能够在居住空间更充裕的农村地区提供住所、愿意采用弹性工作制甚至引导员工反思主流文化的机构、政策利好和基层行动空间、充满机会的后发行业领域以及农村社区的空间聚合和区别于城市化的文化传统等特征,满足了不同动机类型农村社工的生存生活需要和主体性塑造的需要,吸引着他们从业。

其普遍性特征则体现在推力因素上。农村社工面临的大部分困境与城市相似:工作的文牍化、资源动员困难和晋升空间有限的行业特征、机构的营利性策略、政府“既支持又质疑”的态度分别对不同动机类型的农村社工产生着消极影响。最能体现农村社会工作行业特点的推力因素是农村社区的偏僻性,其对于生存生活型农村社工的影响最大,且放大了既有的行业困境。需要说明的是,机构和政府政策要素的差异性较大。不同的机构和不同地区的政府部门展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取向。

本文也发现,不同动机类型的农村社工对于相同环境性要素的情境定义有所不同。比如,社区偏僻性并未成为职业发展型和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的离职原因。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往往在机构处于中高层职位,需要偶尔回到城市参与培训、招投标等工作。这种“候鸟型工作模式”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偏僻性带来的督导和社会支持不足的困境,抵消掉驻村生活的单调感。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甚至将偏僻定义为反思主流文化的“好情境”,善于并乐于在其中发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联系。

农村社工的动机分类对于发展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有一定的启示:总体上,农村社工既有对于生存和生活的现实诉求,也渴望成为行动和创造的主体。虽然农村社工从业动机的提升存在结构性困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社工个人的主体性构建可以实现对这些困境的突围。相关政策不仅要着力提升农村社工的待遇福利,也要尝试照顾不同类型农村社工从业的动机。政府有关



部门可以推动与职业发展型农村社工的协商、互动,在救助资源分配、扶困方案制定等方面适当吸纳他们的意见。社工机构则应当保证财务透明,以及机构的非营利性,为利他反思型农村社工的动机实现提供良好的环境。机构在日常管理中应当对于不同职级和不同动机类型的农村社工分类出台相关的激励制度,尤其是对于多为生存生活型的一线农村社工应定期提供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尽可能减轻农村社区给其带来的封闭感。

在学术研究上,以往针对社工的大规模调查,往往纳入工作满意度、职业认同这些变量。未来也应当开发衡量社工改造社会、践行利他主义等意愿强度的变量,或直接使用已经相对成熟的量表工具如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对个体的价值动机进行测量,并考察其影响因素。此外,现有关于农村社工的经验或实证研究数量依然偏少。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应当专门针对农村社工开展更深入的质性研究或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或利用问卷调查同时测量农村和城市社工的从业动机与离职意愿,通过比较分析更清晰地理解农村社工的动机特征和需求。

### 参 考 文 献

- [1] 杨竹,吴晓萍.从行政主导到专业主导:西部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践与反思——基于民政部“三区”计划在贵州的实践[J].农村经济,2018(5):15-21.
- [2] 李侨明,张和清.社工“学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十年评述(2006—2016)[J].社会建设,2017,4(1):31-41.
- [3] LIU B. Evidence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09, 75(2): 349-365.
- [4] 唐立,费梅苹.薪酬激励抑或情感支持:社会工作者流失之因探究[J].青年研究,2020(2):59-69.
- [5] LEI J, LUO M, CHUI E, et al. Wheth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matters: attitudinal antecedents to the turnover intentions of social workers in Guangzhou, China[J].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2019, 45(3):444-454.
- [6] 徐道稳.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和离职倾向研究——基于对深圳市社会工作者的调查[J].人文杂志,2017(6):111-118.
- [7] 安秋玲.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2):39-47.
- [8] 孙中伟,周海燕.工作条件、家庭支持与职业发展:中国社会工作者离职意愿的多因素分析[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19(4):29-36.
- [9] 王忠,张琳.个人—组织匹配、工作满意度与员工离职意向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0,7(3):379-385.
- [10] WANG Y, ZHANG H, LEI J, et al. Burnout matter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ocial work: differential predictability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9, 28: 217-228.
- [11] 杨发祥,叶淑静.结构性约束与主体性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J].江海学刊,2016(6):101-109.
- [12] 姜海燕,王晔安.承认的作用:基于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实证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6(4):149-158.
- [13] 王文彬,余富强.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为例[J].社会工作,2014(6):57-66.
- [14] 竺幸波.离去与回归:推拉理论视角下的社工职业流动[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5.
- [15] 向羽,袁小良,张和清.“双百社工”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何以可为[J].社会工作,2020(4):97-108.
- [16] 李迎生,李文静,吴咏梅,等.社会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需要、模式与介入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3(1):78-89.
- [17] 张和清,廖其能.乡镇(街道)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中互为主体性建构研究——以广东“双百计划”为例[J].社会工作,2020(5):30-34.
- [18] 郑广怀,王晔安,马铭子.“以红领专”: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性与国家的领导权建构[J].社会学研究,2021,36(6):136-155.
- [19] 王傅,吴亚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驻村社会工作者习得性获得感的建立研究——基于A省B市双百社工站的调查[J].学习论坛,2019(2):77-84.
- [20] GUMPERT J, SALTMAN J E. Social group work practice in rural areas: the practitioner speak[J].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1998, 21(3): 19-32.
- [21] MACKIE F-E P. Are social workers really burned out? An analysi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social workers[J]. Journal of rural mental health, 2008, 32:3-18.
- [22] TALEBREZA-MAY J W, JENSEN R, SHAY N. An assessment of the strengths and needs of rural social workers in the North-western United States[J]. Contemporary rural social work journal, 2017, 9(1): 1-11.
- [23] LONNE B, CHEERS B. Rural social workers and their jobs: an empirical study[J]. Australian social work, 2000, 51(1): 21-28.
- [24]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25] 丁瑜. 妇女何以成为社群主体——以G市L村妇女自组织营造经验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4): 49-64.
- [26] 阿兰·图海纳.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M]. 狄玉明, 李平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27] THOMAS W I. The unadjusted girl, with cases and standpoint for behavior analysis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 [28] CHATMAN J A . Improving interactional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 model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3): 333-349.

## Motivations for Job Selection and Quitting of Rural Social Worker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HE Yufei, WAN Jianghong

**Abstract** Exploring implicit logic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job selection and quitting of rural social workers will benefit human resource building of rural social workers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cial work to help rural vitalization.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field and Alain Touraine's illustration on the concept of subject, a case study of 21 rural social workers finds the motivations for being social workers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for living,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for altruism and reflection. In general, rural social workers have realistic demands for survival and life, but also desire to gain a sense of meaning and become creative and even altruistic subjects. The industry, institution, government or policy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occupational field of rural social work not only have their special features, some of their advantages help to shape the subject of rural social worker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limitations similar to those of urban social work, which push the social workers to quit their jobs. Future policy should not only promote occupational welfare but als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of self-realization for rural social workers. Scales to measure social workers' willingness to transform society, practice altruism and reflect on mainstream value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applied to future related studies.

**Key words** rural social workers; motivation for job selection; motivation for job quitting; field

(责任编辑:余婷婷)